

“娜拉”走后怎样？ ——论《娜拉走后怎样》与《幸福的家庭》、《伤逝》的主题互文性

洪永春*李永求**

目录

- I. 前言
- II. 《娜拉走后怎样》：“出走”是需要条件的
- III. 《幸福的家庭》：“娜拉”出走后的一种生活图景
- IV. 《伤逝》：“娜拉”回来了！
- V. 结语

I. 前言

读了关于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的主题互文性方面的研究文章，从中受益匪浅。虽说“立人”思想是鲁迅小说的主旋律，但《呐喊》与《彷徨》之间的确存在差异，前者肯定和信誓旦旦的成分多于疑虑和反思，而后者恰恰相反。鲁迅的思想情况相对比较复杂，前后矛盾和偏执的地方也屡屡存在。一提到鲁迅的小说，人们往往以“深刻”二字冠之，其实多有偏颇和误读。当然鲁迅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确有深刻、独到的地方，这与他本人特有的生活和思想经历不无关系。鲁迅作品的启蒙不独在思想方面，有些是在生存常识方面，即面向现实的“务实态度”。因为现实中的青年（作家、读者）盲目的畅想和照搬的成分居多，实际的成分太少，容易在现实生活中遇挫和走弯路，甚至是造成不必要的悲剧。本文选择鲁迅的一篇杂文和两篇小说作为探析对象，虽说跨体裁，但鲁迅的思想的确分布在他所有的作品中，而且互有补充和照应，以此来共同构成了他丰厚驳杂的思想。而且以上作品的创作时间相对集中，前后间隔不超过两年，思想意蕴上也是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是鲁迅仅有的关于个性解放和爱情婚姻题材的三篇作品，其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较为明显。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由法国批评家朱利娅·克里斯蒂娃首先提出的，亦称“文本间性”、“文本互涉性”，指的是一个文本与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其基本内涵指的是，任何一个单独文本都不是自足的，都是在与其它文本的相互参照、交互指涉过程中产生的。广义的互文性，指的是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各种语言、知识代码和文化表意实践间相互指涉关系，它意味着欲望、历史、文本等语言学或非语言学、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间的相互指涉关系。¹而在结构主义和非结构主义文论中，互文性更多的则被看作是一种文本建构和文本解读理论，它广泛地影响或渗透到文学创作、文学接受、文学批评的各个领域，引起西方众多理论家

¹ * 通化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博士生chishui1314@163.com](mailto:chishui1314@163.com)。

** 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ykli@hufs.ac.kr。

的关注并由此形成了复杂多元的观点。本文所说的互文性，指的是狭义内涵上的互文性，强调的是文学文本之间的相互参照、交互指涉关系，主要是“指不同文本之间结构、故事等的相互模仿、主题的相互关联或暗合等情况，当然也包括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的直接引用”。⁽¹⁾

以此来观照上述三篇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不同体裁和独立的文本之间的相互参照、相互指涉，从而构成的相对完整的话语系统。在《娜》一文中鲁迅借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提出了一个命题，并陈述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以供女师大学生们的参考和思索。而在《幸》和《伤》中具体描述了“娜拉”走后的两种情状：一是“娜拉”的现实生存苦境，一是“娜拉”回来了，回到了生活最初的原点。有意味的是鲁迅对自己的命题有所修正，一是避开了“娜拉”的堕落情状，一是延伸和扩大了“回来”的情状，那就是悲惨地死去，以及不回来的另一种可能——艰难地度命。尽管鲁迅创作以上作品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其作品内容和思想走向无形中构成了互文关系。

II. 《娜拉走后怎样》：“出走”是需要条件的

这个话题首先应该从“易卜生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对于异域文学观念的吸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较之戊戌——辛亥革命时期有了相当的发展。这就是从言情小说为主转到以社会问题为主的文学，从民族革命为主的观念转到个性自由为主的观念。新文学运动的参与者们十分重视从西方吸取新的文学观念，以促进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胡适认为，文学的进化一方面是随着时代生活变迁的历史，另一方面是摆脱种种束缚力争自由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学由于“不能完全扫除一切枷锁镣铐，后来习惯成了自然，便如缠足的女子，不但不想反抗，竟以为非如此不美了”。所以它只能够“有局部的成功”，而不能完全自由地发展；与此相反，西方文学“便是自由发展的进化”。

(2) 因此，他坚决主张用西方的文学观念来拯救中国文学之弊。这个时期的文学革命，最杰出的贡献就是“人的发现”。所谓“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当时的文学批评和创作都是有意识的或下意识的向着这个目标。个人主义，原是资产阶级的重要意识形态之一，故在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封建思想开始斗争的‘五四’时期而言，个人主义成为文艺创作的主要态度和过程，正是理想必然。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意义，亦即在此。”⁽³⁾ 正是为了适应新文学倡导者们反对非人的文学、建立人的文学需要，“易卜生主义”才得以在中国文学界、思想界广泛地传播。为此，鲁迅在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不是偶然的，这里既有对“易卜生主义”肯定和赞扬的一面，也不无在中国现实倡导“易卜生主义”的种种疑虑和担忧。²

“娜拉”是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她不甘于“幸福之家”的玩

(1) ² 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 第167页。

(2)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第四号。

(3) 《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第298页。

偶角色，毅然出走，去寻找自己独立的人格世界。这部戏在当时的欧洲妇女界影响广泛，“五四”时期介绍到中国也是掀起了一股“易卜生”热潮。这说明鲁迅的讲演极具时效性和现实针对性。鲁迅在演讲中主要探讨的不是“娜拉”是否应该出走的问题，而是出走后会怎样。已年届中年的鲁迅没有停留在思辨和推理层面，而是较之年轻人多了份生活的沉重感和人生的杂色。鲁迅为“娜拉”出走的远景是这样预想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4）总之，鲁迅对“娜拉”出走后的前景不抱乐观态度，整体上是消极和否定的。除此之外，出走的“娜拉”就没有其它可能性吗？如幸福美满的，或艰难活着的。乍看起来，是不是鲁迅的期望值太高了，好像是发现了文中的逻辑缝隙，其实不然。因为鲁迅的演讲重点不在这里。“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了；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它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她还需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5）因为“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故不是钱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6）在这里，鲁迅点明了“娜拉”盲目出走的风险性所在。“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社会里，经济权就显的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等知道仍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7）显然女子经济权的获得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这需要无数“娜拉”的努力，甚至牺牲。不过，鲁迅却强调斗争方法，即“震撼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8）最后，鲁迅为“娜拉”的出走预示了一线稀微的曙光“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是要达到的。但是从哪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9）此文思路清晰，说理透辟，层次分明，言简意赅，收束也自然、切当。鲁迅告诫学生们不要盲目地学“娜拉”，毫无准备地意气出走，否则等来的失望或许大于希望，甚至是悲剧。对于年轻“娜拉”的殷殷关怀之情溢于言表！³

III. 《幸福的家庭》：“娜拉”出走后的一种生活图景

《幸》创作于1924年2月18日。1923年是报刊上讨论“爱情”、“配偶”之类问题热闹非凡的一年。其中，《晨报副刊》上关于“爱情的定则”的讨论和《妇女杂志》上

³ （4）《鲁迅全集》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 第54页。

（5）《鲁迅全集》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 第55页。

（6）、（7）同上。

（8）、（9）《鲁迅全集》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 第56页。

关于“理想的配偶”的讨论是影响最大的两次。而当时的鲁迅对报刊上的这类讨论，一直予以深切地关注。当时的《妇女杂志》编者企图通过问题的讨论帮助青年们正确择偶，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问题是在这次讨论中也暴露了一些年轻人不实际的思想念头。有的年轻人从性情、学问、志趣、道德、年龄、体育、经济、容貌、嗜好、思想、美术等十一个方面提出选偶条件。有的则这样写道：“我之理想的配偶，是在专门学校里毕业的；她的国文和算数的程度都很好，尤其擅长的是钢琴和唱歌；她不但能画工细的花鸟，还能写很秀丽的中英文字；她最喜欢研究自然科学。她又受着很好的家庭教育；她很喜欢读书，更善于和友人交际；她很爱清洁，常常亲自检查饮食的原料，而对厨房中用的器具东西更格外的注意；她小我四岁半，身子很健全，有六十英寸以上的高度，一百十磅的重量。”更有甚者选偶条件达五十条，共分四大纲，其中包括的项目有“康健时常用冷水浴而不间断的”；“善于书画”；“精于英语”；“长于音乐”；“能够游泳”；“不戴眼镜”；“曾入幼稚园”；“经过多次之旅行”等等。（10）这些不切实际的择偶条件几近苛刻和离谱，远离了刊物编辑的初衷。在这次的征文活动中，当时的新进作家许钦文写了一篇题为《理想的伴侣》的文章，对征文中出现的华而不实的荒唐情状作了不乏幽默感的嘲讽。鲁迅有感此文，也急就了一篇题为《幸福的家庭》的小说，副题是“拟许钦文”，其用意也是不言自明的。不过，鲁迅的小说题目与征文的题目多有出入，它不是直接谈理想的配偶问题，而是找到了理想的配偶之后会怎样，与《娜拉走后怎样》的文章如出一辙，在人家结束的地方提出问题，把谈论的话题引向纵深。事实上可以把《幸福的家庭》换成《找到了理想的伴侣会怎样》的题目。鲁迅不是认为“理想的配偶”话题不可讨论，而是反感于征文中出现的严重脱离生活实际的游戏之辞，想撰文来刺一下世人的无聊之举，但文章写来就不知不觉的导入“经济”二字的窠臼。或许“钱”字给鲁迅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少年时的他就为治疗父亲的病患奔走于当铺和药铺之间，又由于学费问题不得不逃异地，寻异路（学洋务），遭尽了世人的白眼和蔑视。从日本归来他毅然担起整个家庭的生计问题，也是四处奔走，疲于奔命，晚上又要点灯熬油为了那能换几文钱的稿费。所以他的《幸》由不乏幽默感的讽刺笔调始，行文至末段生活的压抑气氛愈来愈浓重，这恐怕与作者本人的切身体验不无关系，前后的风格不觉变了调，走了板，再也没有轻松的味道了。这篇小说看似平常、简单，以前也从未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抛头露面过，但在艺术上却颇为匠心独到。小说的标题与文中的题目重合，是小说套小说。该文有两个线索并置、交叉推进，且由两个线索构成想象世界和现实世界。情节先由现实世界进入想象世界，然后二者交叉呈现，最后回到现实世界，结束故事，主题意义也随之昭然若揭。想象世界呈现的是A地的一个小家庭，年轻夫妇皆留学欧美，两人自由恋爱成婚，相亲相爱、互敬如宾，志趣相投，房子宽敞，设施齐全，家境殷实，餐桌上不重样，显然是西方中产阶级家庭的幸福生活图景，好不让人羡慕和向往。⁴现实世界呈现的是一个文人想写篇文章贴补家用，但他的构思不断被“柴米油盐”等琐碎的生活问题所打扰和妨碍，最后在小女儿的啼哭

⁴ （10） 曾华鹏 范伯群《论《幸福的家庭》》载《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03期。

声中不得不中断构思，无奈地把写有“幸福的家庭”字样的文稿掷入纸篓中。小说的结尾，男主人公想闭目静思，息了各种杂念，可眼前上演的依旧是劈柴堆和白菜堆的交响曲。文中最有趣的是关于餐桌上的一个场景描写：“于是一碗“龙虎斗”摆在桌子中央了，他们两人同时捏起筷子，指着碗沿，笑眯眯地你看我，我看你……。”“My dear, please.”“Please you eat first, my dear.”“Oh no, please you!”“于是他们同时伸下筷子去，同时夹出一块蛇肉来，——不不，蛇肉究竟太奇怪，还不如说是鳝鱼罢。那么，这碗“龙虎斗”是蛙和鳝鱼所做的了。他们同时夹出一块鳝鱼来，一样大小，五五二十五，三五……不管他，同时放进嘴里去，……”(11)如果把两个世界并置起来看就是想象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不断冲突矛盾，而且现实世界的力量不断变得强大，最后迫使想象世界不得不做出妥协，直至投降。小说结束的时候，我们反观“幸福的家庭”的标题，其强烈的对比、反差的效果自然流溢出来。文中的男女主人公皆是两情相悦的出走“娜拉”，可谓名副其实的理想伴侣，尽管二人没有堕落或回来，但琐碎甘苦的庸碌生活绝不是他们出走前的想象。没有经济权的“娜拉”免不了也要出走，但为了“自由”出走，却很有可能“不自由”的生活，或者说这是为自由付出的代价。《幸》呈现给我们的图景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鲁迅的言外之意，出走的“娜拉”存在多种可能，但不管是何种图景，受经济制约一条是恒古不变的，这是一切问题的瓶颈所在，忽略了它大小悲剧和准悲剧就会一连串找上门来。鲁迅的现实精神和认真态度从中可见一斑。

IV. 《伤逝》：“娜拉”回来了！

《伤逝》创作于1925年10月2日，后结集在《彷徨》里。对《伤逝》的研究文章可谓不计其数，因为一直把它当作鲁迅小说中的重要篇什，曾多次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关于《伤逝》的主题阐释概有以下几方面：社会压迫说、经济困顿说、爱情破裂说、启蒙弱点说等等，以此来评析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上述阐释都确立了各自的逻辑出发点，理论上也能自圆其说，不过给人的印象是外因强调多了，道德评判多了，思想色彩多了，相对爱情本身的言说少了。虽然二人的分手存在多种原因，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感情问题。若过多言及其他，免不了先入为主地概念化阐释之嫌。易卜生在1871年9月24日写给他朋友勃兰兑斯的信里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是你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是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只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的船，最要紧的还是救自己。”(12)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也有类似的一段话：“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⁵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渡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个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

⁵ (11) 鲁迅：《彷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34-35页。

(12) 《易卜生书牒》第84页。

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的棉袄来冻杀自己。”（13）这既是鲁迅对易不生主义的正确解读，也是对当时个性解放运动的正确概括，即先解放自己的个性，做一个独立人，然后方能自由地选择和发展自己的人生。其实，关于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描写完全服膺了这个思想逻辑。当然这里有谁是启蒙者，谁是受启蒙者之分，但爱情是男女双向的事，二者缺一不可。双方必须都是独立的人，个性的人，才能做出自由的选择。从小说的行文看，先是涓生启蒙子君，后是觉醒了的子君反哺了涓生的启蒙，“爱情”上的启蒙只能是双向互补的，最后，二人彼此接受对方，融为一体。如涓生常跟子君“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雪莱……。”（14）后来的子君终于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 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来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得那样的无计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15）涓生和子君是那个时代的启蒙先驱和爱情先锋，这一称号是二人相互激励和共同努力换来的，而不是好人撮合，更不是上天所赐，这就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个性化爱情。涓生和子君是彼此满意和憧憬的，因为今天的一切来之不易，他们战胜了社会，战胜了家庭，也战胜了自己，这归功于爱情的力量和年轻人的无畏勇气。从二人的爱情悲剧结局出发，鲁迅本人也用“盲目的爱”来评判他们的行为，这种评判多有概念化之嫌，若他们幸福美满是否该用“正确的爱”来冠之呢？涓生与子君之间的爱不乏理性的成分，也符合理想配偶的标准，他们不是莽汉和愚女，而是接受了近代教育的时代新青年，他们的爱情不仅符合时代青年的心理，也合乎时代发展的潮流。涓生与子君的爱情从触礁到分手，其实也很符合时代青年的方式——好合好散。涓生在生活和情感的双重危机面前思虑再三，坦言自己的意见：“……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的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16）许多人认为，这是涓生不负责任的开脱之举，自私的表现，如此解读只能再一次陷入到传统爱情婚姻的道德评判中，是对二人自由婚姻的颠覆，看似对女性的关怀之情茵茵，却对于新女性身份是一种褻渎。当时的涓生见生活毫无转机的希望，而伴他的子君只有冷色和暗淡，与其拴住人家，不如还她自由，好让她重做选择，自己也再寻他路。显然，二人的性格和生存能力上是存在缺陷的，生活遇挫时不能及时调整心态，携手共进，谋生方式也有些单一，对外界依赖性过强，一味地耽于等靠，在残酷的生计危机面前，书生、小姐的爱情梦终于破灭了。⁶鲁迅创作《伤逝》的最终意图恐怕也在这里，描绘了一对儿没有社会和家庭保护的爱情鸟在大难来临时的各自纷飞图。《伤逝》的结局符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性特点和利己特点，我们不能让涓生和子君负载太多，让他们掬爱情悲剧的罪名。从现

⁶（13）《鲁迅全集》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 第55页。

（14）鲁迅：《彷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07页。

（15）鲁迅：《彷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08页。

（16）鲁迅：《彷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19-120页。

代意义上来讲，他们的爱情模式和分手模式没有不合理之处，自由地选择爱情，自由地享受爱情；自由地协议分手，自由地承受爱情的苦痛。生活都有个变数，爱情也不例外。虽然我们在解读《伤逝》时可以给主人公贴上谁是谁非的标签，可生活本身和爱情本身远比这复杂得多。涓生和子君由“出走”到“回来”，重又回到生活的原点，可他们毕竟飞过，少不了当过哪个准“娜拉”的楷模，先驱的位置是谁也夺不去的。鲁迅最后让涓生回到了冷寂的会馆，让子君回到了死寂的旧家，直至默默地死去，是有些肃杀和寒气逼人。小说的这种处理刻意之功较为明显，不是要就言情而言情，而是要借言情寓其它，那就是告诫“娜拉”：“出走”是需要本事的，飞行前要掂量一下自己的翅膀是否有足够硬，否则免不了要“回来”或“堕落”！

V. 结语

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的鲁迅，在以上三篇作品中，无论是探讨个性解放问题，还是幸福家庭问题，抑或是爱情婚姻问题，无不围绕“经济”话题。虽说有把经济问题过于绝对化之嫌，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始终不渝地关切经济问题。因为“经济”二字一直不离鲁迅话语的左右，仔细究来，兄弟失和的原因固然很多，最初的元凶恐经济二字莫属。正如当下世俗流行的一句话：钱不是万能的，但无钱是万万不行的。鲁迅的意思虽然不是无钱免谈个性解放，而是要观念先行的“娜拉”，出走之时千万不要忘了生存的要义。在《幸》一文中也强调，有钱不等于幸福，但缺钱的生活万万无法幸福。《伤》中的爱情悲剧也不是一个单纯的钱字造成的，但“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元凶，是它引发和加剧了涓生、子君的感情裂痕。涓生的一句反省之言再精辟不过：“盲目的爱，一一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附丽。”（17）其实是鲁迅借涓生之言再一次强调经济的制约性。“五四”时期对经济问题的关注不是始于鲁迅，但在其小说中如此强调经济因素是他的一大特点，这也是他后来质疑、反思启蒙话题的一个切入点。综上可见，与其说鲁迅深刻，不如说鲁迅实际，鲁迅务实更为确切。⁷

⁷（17）鲁迅：《彷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17页。

参考文献:

- (1) 曾华鹏、范伯群,《论〈幸福的家庭〉》,载《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03期。
- (2) 沈文慧,《互文性:〈呐喊〉、〈彷徨〉的现在品格》,载《长江大学学报》,2006年04期。
- (3) 杨春风,《对新式婚恋感伤地嘲讽》,载《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07期。
- (4) 李君,《日常生活意义上的〈伤逝〉》,载《名作欣赏》,2008年02期。
- (5) 马瑞海,《〈伤逝〉爱情悲剧根源探析》,载《内蒙古电大学刊》,2007年02期。
- (6) 朱郁文,《从〈伤逝〉看鲁迅对启蒙的反思》,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06期。
- (7) 王学谦,《〈娜拉走后怎样〉的重新解读》,载《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07期。
- (8) 曾红,《中国“娜拉”走后怎样?》,载《西昌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03期。
- (9) 高小红,《“娜拉走后”的两个风景》,载《柳州师专学报》,2005年03期。
- (10) 傅建安,《“娜拉走后”现代命题的当代演绎》,载《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年05期。
- (11) 易升云,《西学东渐与自由意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 (12) 《韩国的鲁迅研究论文集》,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

“娜拉”走后怎样？
——论《娜拉走后怎样》与《幸福的家庭》、《伤逝》的主题互文性

洪永春 李永求

摘要：本文从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与《幸福的家庭》、《伤逝》的主题互文关系分析入手，探讨了作者在个性解放、爱情婚姻问题上异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启蒙特点，既非常现实地考虑经济因素的制约，而不是热衷于单纯的思想启蒙和舆论倡导。

关键词：鲁迅；启蒙；娜拉；互文性；经济

what happened after "Nora" left ?
- Comment on the theme of Intertextuality of "left Nora how" an
"happy family", "Regret for the Past".

Hong Yong-chun Li yong-qiu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analysing the themes' relationship among Lu Xun's "Nora left how" and "happy family", "Regret for the Past," to discuss the author different from other contemporary writer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the liberation of personality and love and marriage problems. Not only very realistic to consider economic factors, rather than simply keen on the idea of the Enlightenment and advocate of public opinion.

Keywords: Lu Xun; Enlightenment; Nora; Intertextuality; economy